

# 今日評論

第一卷第七期

時評

敵國議會論戰(信)

蘇日磨擦(弋)

美總統援助英法(端)

政治的制度化

國家與經濟事業

學生自治與學生自治會

熱烈與遲鈍

談讀尼采(一封信)

人

錢端升

張德昌

潘光旦

吳景岩

馮至

孫毓棠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爲新聞紙類

### 敵國議會論戰

日本的議會政治因爲憲法及法律上的種種限制，不能充分發揮權力，歐戰後因爲自由主義的澎湃，政黨議會政治雖仍一度抬頭，但不久便被九一八的浪潮所摧毀，一九三三年的五一五法西斯政變後，政黨完全屈服，從此每况愈下，近衛內閣的辭職象徵着自由主義的沒落，平沼雖未取消政黨，但政黨的存在已經無足輕重。所以日本人民對於這次議會非常冷淡，一般輿論的推測，都認爲主要問題如龐大預算經濟統制等必能如政府所預期的通過，爭辯也不過涉及那些不着邊際的問題而已。第七十四屆議會自一月二十一日復會迄今，將近二星期了，每天都有辯論，問題雖然涉及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各方面，但都沒有針對着政中的要害，語氣與其說是攻擊，無甯說是質疑，對於政府的含糊答覆，既無追擊的勇氣，更談不到短兵相接。

這些辯論雖無積極的意義，但在消極方面，可以反映出日本國內，對於戰事的悵惘，經濟的憂慮和外交的苦悶。關於對華戰事，雖然沒人敢公開表示懷疑，但如政友會議員原口的質問對華港大戰費將繼續至何時，佔領區域如何建設，東方會議員北聆吉的質問在華軍隊的糧食將如何解決，民政黨議員中島的質問對於中國幣制究採何政策，政友會議員山本的質問對於深入中國民心的三民主義究將如何應付，以及某議員的質問「東亞新秩序」究至何時能實現，都暴露出日本人民對於戰爭前途的憂慮和戰後統治的悵惘。

關於經濟方面，對華戰費迄今年三月止，已耗去七十四萬萬日圓，加以昭和十四年度預算之四十九萬萬（連預備金五億五千萬在內），合計將達一百二十三萬萬，若將昭和十二年度海陸軍經常費之十八萬萬，十三年度之十二萬萬及來年度之十一萬萬五千萬合計在內，將達一百六十五萬萬之鉅額。公債方面迄至去六月止。已發行一百四十億，七月至今年三月止，平均以每

月發行三億五千萬計，合計將達一百七十餘萬萬，大藏省的預備金，國民的郵政貯金和各銀行及大公司的公積金大部變成公債了。但按昭和十四年度預算，尚須發行公債五十五萬萬，究將如何蠶澤而漁？紙幣的發行石渡辭相公開承認去年底已發到二十八億五千萬，較之戰事前的十億左右，增加將近三倍。稅收方面在「北支事變特別稅」的名義下，去年兩年已經增徵三億一千七百萬，下年度尚計劃增稅二萬萬。這種殺雞取卵的辦法無異自掘墳墓。而在收入方面如對外貿易額的銳減，入超的激增，黃金的減少，儲金的消耗，和平工業的彫落，國民收入的減低，物價指數的增長，生活程度的提高，日本的經濟基礎將根本動搖。所以在這次議會中，關於經濟的質問最多，如鉅額戰費的如何籌措，公債消化力的如何維持，惡性通貨膨脹危機的如何避免，對外貿易的如何安定等，都使軍部及政府當局窮於應付，政黨雖無追擊的勇氣，但已充分暴露日本經濟的危機了。

外交方面民政黨的質問擴軍計劃是否以蘇俄與中國兩國爲標準，對蘇準備是否有缺陷，英美龐大海軍計劃是否威脅日本國防，萬一太平洋中發生緊急事變，海軍力量够否應付，海軍燃料是否足用，一方面暴露對於軍力的懷疑，同時也告訴了我們日本國民對於國際局勢的憂慮。而關於英美外交的質問更多，政府對於英美的援華採何政策，對日經濟壓迫有何準備，民政黨議員小山一再主張邀請英美，舉行國際會議，有田答覆既謂對英美政策現尙未便強硬，但又認爲在當前情勢下，欲使第三國明瞭東亞局勢，殊屬不易，外交途徑頗多荆棘，惟當盡力避免第三國誤解，以求其協力而已。政府及民間對於外交的苦悶，到此已昭然若揭了。（惜）

### 蘇日摩擦

近日，蘇俄邊境又時有衝突。據長春電訊，上月三十日，蘇軍越界侵入「滿」境，致被日軍擊斃三人

：本月三日，蘇軍復在孟克西里（在滿洲里東北一百二十里之處）三次與日哨兵互相射擊。蘇俄邊境衝突事件，自九一八以後，不斷發生，而以去年張鼓峯事件為最嚴重。當時一般觀察者，都以為蘇日戰事，恐不可免。而雙方容忍的結束，停戰談判順利進行，一時震動世界的衝突，遂告結束。然自張鼓峯事件之後，蘇俄邊境衝突事件仍是時常發生。這足以表示張鼓峯事件談判，並沒有澈底解決邊境問題，而邊境問題直至今日，尙是蘇日間摩擦主因之一。

邊境問題之外，可以促使蘇日關係緊張之事件，正日有增加。其明顯者，如（一）漁權問題，（二）日輪被扣問題，（三）庫頁島之邊境事件，（四）油糧糾紛，（五）中蘇之關係，再加以日少壯軍人驕恣狂悖的態度，兩國間的摩擦當然因而更為增加。

若謂蘇日兩國，將有意識的，藉口於上列事件之一，訴諸兵戎，固或有神經過敏之嫌。張鼓峯事件的經過，很明顯的指明，兩國並沒有大規模作戰的預備與決心。無疑的，上列事件此後將繼續造成地方或局部的衝突，而在可能範圍之內，此項衝突總還是由雙方容忍而局部解決。然而這並不是說蘇日因摩擦而作戰是絕不可能。別的摩擦雖未必直接產生戰事，而一切摩擦的層疊確可造成兩國間勢不兩立的局面。容忍，讓步，等等，都是在某種圍策之下，冷靜的處置。如果層疊的摩擦，真造成勢不兩立的局面，一個新的導火，也許可以沖破一切冷靜的處置，而引着一個巨大的爆發。（七）

### 美總統援助英法

二月一日羅斯福出席參院軍事委員會，表示美國應以軍火售給民主國家，以加強民主國家的自衛實力。按美國國會委員會，有時公開，亦時守秘密。總統出席委員會本是不常有之事，且事關外交及軍事，一日之會當係秘密。但軍事委

員會中的參議員不少向屬孤立派者，如奈埃與克拉克即是。他們所主張的中立，本以美國不加入戰爭為主要前提，當然對於是非之間，侵略與反侵略之間，也不願太作分別。他們認為羅斯福助民治抑極權的傾向，將促美國加入衝突的壁壘，他們不願羅斯福的主張見諸實行，所以他們便洩漏秘密於各報，所以這個消息便傳遍天下，激起許多人許多國家的擁護，也激起孤立派及意德等國的反對。

從美國的憲法而論，總統絕對有權可以用上下軍火輸出的方式，來援助法英等國。美國的飛機及其他軍火品製造業，在若干限度之下，是受聯邦政府的管轄的；總統既是聯邦政府的行政首長，當然可以促軍火業儘量為民主國製貨。中立法只能限制售軍火於交戰國，亦不能限制售軍火於承平國家。孤立派當然要想法通過決議案以限制政府的權力，不許政府對德意日及英法間有所歧視；但這種企圖固未必能成功。在成功前，總統固有權用多售軍火的方法來援助英法。

從人類的正義及和平而言，美總統的主張更值得我們的欣感。老實說，德日意侵略軸心之所以敢如此囂張，完全由於英法軍備的落後，與美國的中立，而英法軍備的落後則亦只在空軍方面（陸軍方面法英擴充較易）如果英法空軍可以急起直追德意而等之，甚或上之；或即未追上，而美國即有不中立，即有將以實力助英法的表示，則侵略軸心的各國便須面面相覷，抱頭鼠竄而散。羅斯福的辦法是雙關的，一方面可以增快法英的擴充空軍，一方面又表示美國可以不參戰而以實力助英法。固然羅斯福因為孤立派妄引（美國邊界即在法國）一語引起誤會，於二月三日又聲明美國國策未變，但他仍將以和平方法維持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獨立。換言之，他仍將用多售軍火的方法來英法等不受侵略。（端）

## 政治的制度化

錢端升

本刊第五期中傅孟真先生有一篇文章，論「政治之機構化。」他所稱的機構，不是什麼「調整機構」的機構，而是「文物制度」的制度，亦即西文（Institution）之意。他所主張的政治之「機構化」，不是說政治貴有適當的機構，而是說「政治之非個人化」，「政治之應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政治之應以制度為基礎，應有制度的基礎（Institutional basis）。這「制度化」一道手續，這「制度的基礎」一個基礎，實在是古今中外任何有進步性的國家所不可不經的一道手續，所不可或缺的一個基礎，而尤為當前的中國所應努力以求者。問題是十分重要，故今特將傅先生之意再加以引中。

人類的文化本是日積月累而成的。無論在那一方面，在責任方面，建築方面，耕種方面，文字方面，禮儀方面，或是在其他方面，我們均可證明人類今日所具有的造詣，是經過長時期的累積而獲來的。

在政治方面，這累積的作用尤其是顯著而不可少。政治的進步全靠兩種作用，第一種是累積的作用（Cumulative effect），第二種是革命。革命的需要任何人都不否認。不論那一個國家，到了政治積弊太深，無法改善，或是舊的制度絕對無法適應新的環境時，只有採用革命的手段，創造一個新的局面與新的制度。但在革命完成以後，在平時，要新的局面能鞏固，要新的制度能發生效用，能發生福國利民的效用，則又非靠累積的作用不可。而要望日常的政治設施能累積起來，則又非靠政治制度化不可。政治制度化的重要即在於此。

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充滿了革命與累積互相輝映，以使政治進步的例子。在君主制的中國時代，所謂創業就是革命。大概一個舊的朝代，因為有着政治上的怠性與忠君的思想做護符，除非實在腐敗得不可救藥時，是不容易推翻的。同時，一個創業之君，除非他自己有政治的天材（儘管他是一個草莽英雄），或是有極高明的輔佐者，也不易成功。我國歷朝創業之君，儘多有許

多不自知在革命，實在多是革命者。

在君主制的中國時代，所謂守成也就是收累積的效果。在這裏，制度化便成了一道不可不經的手續。天下可從馬上得來，但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漢高祖那樣一個粗人，也須命叔孫通制禮作樂，至於政治上必要的軌範制度的樹立，更不必說。我們如以漢代文景之治，唐代開元貞觀之治，為我國歷史上最燦爛光明的時期，那我們也必須要知道那兩個時期，不但是君賢臣能，而且也是制度確立，大家都循規蹈矩去任事的時期，政治上累積的功用特別顯，而收穫也特別大。「畫地為疆」的一句古語到了今日固已成爲新任官安慰舊任官的僚屬的一句套語，但在向昔則可以表現政治制度化的一種精神。

撇開中國，而看西洋各國的政治經驗，革命與累積之相互為用，以及欲收累積之功則政治必須制度化，必為最顯著的事蹟。我們取十七世紀英國克倫威爾（Cromwell）的革命及十八世紀法國的大革命為例。英國在十七世紀中葉實在需要革命，而克倫威爾也實在是一個了不得的人。他是能文能武的一個全材。他主張宗教自由，他主張民主政治，他主張為大多數人民謀福利。他是熱心戰略的一員大將，他又能深得軍心。他的治軍的能力至今仍傳為美談。至於他個人的清廉刻苦尤為千古所稀有。他之能公忠為國亦為人所共認。但是，因為他不能於掃除斯圖亞特王朝的暴政以後，趕緊樹立一種可以全國共守的制度，因為他不能以最大的決心樹立憲法（幾個草案或則未成立，或則成立而未實行）及其他必要的法制，因為他好獨斷，大小文武一切之事統於一身，所以一六五八年他去世以後，雖然革命的羣衆擁戴他的兒子為繼者，而斯圖亞特王朝終於一六六〇年復辟，而克倫威爾的革命終歸於無成。

拿破崙便不同了：拿破崙掌握了法國的政權幾達二十年之久。在軍事上他終究是失敗了；他也沒有能建立一個新朝，在個人的行為上他更多可以警

議之點，絕不能與克倫威爾的純潔相比。但他的革命畢竟是成功了。波那派脫（拿破崙的姓）的王朝可以倒，波旁王室（大革命前的王室）可以復辟，但大革命時許多建樹，並不隨拿破崙之倒而倒，大革命所革除的許多大弊並不隨波旁之復而復。爲什麼？因爲拿破崙於在位的時候，曾經多方求政治的制度化。他不但改進了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制度，修訂了許多法典，他並且以全力促成法國政治的制度化，防制其個人化。他有許多兄弟及內兄弟們要敷衍，但他絕不容許他們在法國活動。他每征服一個國家，便爲他私人製造了一個地盤。固然他卒因這許多被征服國家的處理失當而致有滑鐵盧的慘敗；但是法國本身亦卒因政治的制度化而着着進步；這進步亦不因波旁復進而中斷，且至今仍存累積着。

再反過來看近代的中國，清代自開國直至和坤用事，政以賄成，政治漸漸變成宮庭化，甚或官宦化以前，除了歧視漢族這一點無可容忍外，實在不算一個惡朝代。我們如研究當日大一點的如吏治制度，考試制度，地方制度，小一點的如軍機處處理公牘的制度，我們俱可發現其政治有一定的規範，一代比一代多一點的經驗，少一點的輕率，而無人在政存，人亡政亡的現象。固然，清代的吏治制度等，取法於明代，得益於明代者甚夥，但清代初期及中期之能遵循制度化的原則，則是無可否認的。及乾嘉以後，首有和坤，末有慶王之流，將二百年來的規度推翻，將政治變成個人化，於是清政不綱；重以近世民族主義的激盪，而革命亦終不可免。

辛亥革命以後，起初十餘年本非革命人秉政，失敗與紊亂是必然的結果，不值得感歎。最近幾年，因爲革命的黨當了權，更加以黨的領導者的賢能，誠如傅孟真先生所說，「中國政治的進展，其神速爲民初以來數百年中所未有。」但也誠如傅先生所說，其所以有此成績者，實由於人力的發揮，

這並不由於法治的運用。因爲政治的進步只靠人力而不由法治，所以第一，尚有許多應該可以實現的進步至今未能實現，第二，已經有的進步，在將來也未必見得能永久。換言之因爲我們的政治尚未制度化累積的功用絕對不能發生。

我記得民國十七年中央日報剛創辦的時候，就有人大聲疾呼，說政治應制度化。可見當時已有人見到因政治不能制度化而生缺陷與危險。此後也有許多人提過政治制度化的重要。但是政治之未能制度化則前後十年，似未有若何變更。這是近十年來我國政治上最可引爲遺憾之事！

推究政治未能制度化的原故，全國人民，尤其與政治有關及於政治有興趣者，都得負責。在上者往往因人治有若干的便利，不能耐煩地努力於制度的樹立。在被用之人，則亦往往重視對人的服從，而輕視對法的服從。再進一步，則法爲人立，人改法改；於是一切制度不是虛設不予實行，便是朝令夕改。制度既無一能有相當的永久，且能有真實的試驗，則其宜與不宜，或應否有所糾正改善之處，自亦無從測知。更進一步，則大家對於制度之爲物，便根本不能重視，不能有敬意了。

所以欲求政治的制度化，政府固然須深切知道制度化的可貴及制度化的必要，國人（尤其是對國事可以說話的國人）更須以最負責的態度，督促政府。凡合於制度化的設施應同聲讚贊之；凡不合者應同聲抗言之。國人但知真觀開元之治之盛，而大多不知此盛治之由於制度化。國人亦知魏徵之直，而大多也不知魏徵常常勸唐太宗守法度。民國的政治本全國人之事，須全國人知制度化的可貴與必需，務須個人能以魏徵事唐太宗之法來對付國家，中國的政治才能由人的基礎，而進於制基制度化。

歡 迎 訂 閱

# 國家與經濟事業

張德昌

統制經濟，計劃計劃，從一方面來看，有一點相同，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支配，管理經濟事業的發展。用政治力量干涉經濟事業，雖為今日所盛唱，但追溯其演變經過，却有幾百年的歷史背景的，這種演變我們可分為三個階段來說。

遠在十七世紀，歐洲各國如英法荷蘭瑞典等，在重商主義的思想支配下，大家都有一個富國強兵的理想。為達到這種目的，各國行了各種政策，藉以求本國工業，商業，航業及農業的發展。其中法國政府是最熱心的，路易十四時代有種種的法令，獎勵新興工業，懲戒不遵守法令的工商業者。英國也是如此。不過他們的政策在大體上說，收效並不如其所期之宏。當然也有奏效的，如英國海上航業的發展，無疑的得力於航海條約之實行。但就全體以觀，我們可以說當時用政治干涉經濟事業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當時的政府組織不健全，其本身不能担当發展經濟的任務。所以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政府是最熱心於發展工商業的政府，但也是失敗的政府。一個政府本身組織不健全，雖有有為之心，往往爲了發展工商業，結果摧殘了工商業。

重商主義時代的以政治干涉經濟事業的先例，是我們在歷史上找得出的國家與經濟事業關係的例子，但是失敗的例子，和近代之統制經濟，計劃經濟，思潮沒有直接的影響。

重商主義時代的政治干涉經濟事業是失敗了，所以引起一種反響。這種反響是說明國家不應當干涉經濟事業。這種說法不但有史實可證，且有其一套學理，力量很大，風行一世。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事實上給我們一個大反證。國家應當干涉，干涉的結果是有利於經濟事業的發展的。十九世紀的佐證，是告訴我們國家對於經濟事業的發展應加以扶助，管理。不但在生產上應加以調劑，而且國家管理的範圍應推廣到各方面去。國家以政治力量支配

理全部經濟事業的例子是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一個特色。在農業方面，歐洲在十九世紀後半有一大的威迫，即美國農產品的侵入。當時各國政府以借款，補助金的方式來維持小農，發展合作事業使小農不受中間人的剝削。德國俄國更大規模改革土地現狀。用鐵路廉運政策便捷農產品的分配。用關稅政策來保障農村。甚至美國，一個農產豐富國家，也採用政治方法來抵制加拿大農產品的侵入。在工業方面，政府規定各種法律限制工業合併，保障工業工人，訓練無技術的工人，提高生產能力，國家不只消極的管理，且漸漸的有政府興辦的工業，最初興辦的如軍火廠。以及其他與戰爭有關的有業。鐵道機廠在國有鐵路國家也自然是國營的，有些工業國家辦理，但又用補助津貼的方法，使私人資本興創，國家可以管理。如俄國的鋼鐵業是在政府重金津貼的有利條件下開辦的。德國的造船業也是政府用政治方式助其成功的。至於交通事業，和國家的關係尤為直接有關，在鐵路私有的國家中，英法等國政府逐漸的獲得管制權力。一切經濟事業，資本組織而外，技術佔重要的地位。如果專憑私人去研究私人工廠商店去個別的訓練工人，範圍影響是很小的，十九世紀以來的國家在這方面盡了很大的任務。研究的機關，教育的機關一大半是政府設立，或是予以方便。我們可以說沒有十九世紀以來政治干涉經濟事業的種種作為，近代經濟事業不會有今日之發展。所以十九世紀以來國家與經濟事業的關係最密切。政治干涉經濟事業的權力增加，範圍擴大。是近代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發生的第一個基礎。

歐洲大戰打了四年的仗，對於國家管理經濟事業更進一步，開了一個新局面。在歐戰期間交戰國的雙方都嚴格的統制經濟事業，其詳情不必贅述。我們只簡單說明兩點。第一、在這四年大戰中，政府支配經濟事業的職權擴展到最大限度。英國戰時內閣的報告中有一段說：「最大多數的人都直接間接為公共而服務。軍士官吏而外，有的人從事農作，有的從事製造，其他的

人盡職於組織，轉運及分配事業。所有生產機關都被政府由私人手裏接收過來。鐵道，航運，煤礦，工程製造以及原料食糧柴炭等等。政府不但要負責籌足，且免責管理，使個人國家兩得其便。政府還要管理物價，抑止過分利潤；管制運費，規定最高物價。統理出入口貿易。總之，舉凡消費生產以及有關事業都使政府第一次做統制的嘗試，因為這個戰爭，使國家之社會，行政組織起一大變化。這許多的變化中有許多是以後不能更易的。『政府既管理各種經濟事業，戰前的政府組織是不足以應付此重大責任的，所以第二點我們要注意的是隨政府職權之擴大而將組織擴大。英國在戰時政府聘僱的大小人員在二十三萬以上。各交戰國情形也是一樣。政府第一次變為最大僱主。這四年的設施，雖是戰時情形，但留了很深的印象在人心裏。國家統制經濟事業已有幾年的實際經驗，達到最有效，最合理的結果。證明了經濟事業應當在國家一個政府之下通盤計劃，這是近代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第二個基礎。

近代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思潮，本此基礎作為先例，以求建設新的經

## 學生自治與學生自治會

潘光旦

在流徙中的許多大學，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漸能比較的安全變業起來了。學生自治的呼聲與自治會的組織就是比較能安居樂業後的一種表現。這是憂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學生自治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學生自治會也是一個很籠統的組織。唯其籠統，它們中間可以包括許多相干與不相干的東西。顧名思義，學生自治應該就是學生自治，自治會就是為自治而成立的一種結合，其間原不應該有甚麼不相干的東西。不過，人類的行為十之八九是『非邏輯』的，即非邏輯所可範圍的，名義表裏相符的事，不是盡人能做，更不是盡人能一刻不間斷的做，於是不相干的東西便借了人事推移，環境逼迫，潮流動盪等等的機會，不斷的加入，變做一個概念與一個組織的中堅部分，充其極，可以教名

濟制代替私人經濟制度。他們的理論我們這裏不必提。不過有兩點我們要提出：一、在一政府下有一個全盤的計劃；二、改變，擴大政府的組織，執行這個計劃。以現在政府的組織不能担負繁重的責任。

以政治力量管理經濟事業，到了現在成了已成的趨勢。不過對於一個已有工業基礎的國家和一個未工業化的國家，問題的性質不同。對於前者，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把私人生產事業轉移於國家之手。在這些國家裏，工商家，地主已有根深蒂固的勢力。社會的阻力是很大的。不過就在這種國家，也可以用和平的方法達到國營的目的。對於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問題便簡單得多。比如中國並沒有大的工商業勢力。推一繁重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在其他方面，沒有任何私人的經濟力量大過政府，政府是最大的資本家，也是最大的僱主。同時也只有政府是最大收羅技術人材機關，訓練技術機關。用政治力量發展經濟事業容易得多，便捷得多。無論在戰時及戰後，中國的工業問題須取決於資本及技術問題的解決，說到資本及技術，除了政府外，有那一個私人力量可與並論呢。

義兩方，不但不符合，並且完全相反。一切概念與一切組織如此，學生自治與學生自治會很不容易做例外。

根據上文的說法，再根據以往學生自治會辦理的經驗，我以為學生自治會可以有許多種類，而不出三四種型列。一是在學生個人與團體生活方面做些修齊功夫的；二是替學生大眾辦事或當差的；三是被校外勢力所支配和驅策的。第一種是真正的學生自治會，第二種談不到一個自治字，不妨叫做學生自治會，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學校統制，也不由個人分別處理而由少數不怕事的熱心分子代辦。第三種談不到一個自治字，應當叫做學生被治會。

第一種比較名義相孚的學生自治會是難得遇見的，但是它的需要却最大，尤其是在這流離顛沛的時期裏。中國舊時的教育，我們以今度古，無論在

方法上怎樣的不贊成，在目標上是不錯的。這目標可以叫做自我制裁。自我制裁又可以分做兩方面，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在情緒生活方面是自勝。所以荀子才有『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兩句話。西洋自希臘而降，最高的教育理想，其實也逃不出這自知與自勝的範圍。

近代的教育儘管有許多進步，但是離開這自知與自勝的軌的還遠，在教育人自勝的一點上，似乎還不及以前的成功，許多辦教育的人也似乎根本不把這當做一回事。各級學校裏儘管有訓育或生活指導的主管部分，但成績是不容易有的，有也全部是消極性質的，例如糾察學生的行為，或懲罰學生的過失等。這也難怪，自勝的功夫本來是應該從一個人的裏面做出來的。一個青年，發育到相當程度以後，對自己的情性，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社會，縱無外來勢力的特殊啓發，會有幾分了解；對一己的情性和環境發生接觸時，應該怎樣的控制自己，在甚麼場合之下應該動，應該進，在甚麼場合之下應該止，應該退，又應該動止進退到甚麼程度，甚麼是操守，操守應該有甚麼分寸——對這些，即使沒有一派特殊的道德教育加以誘掖，他也勢所必至的會因閱歷經驗的逐漸增加，而體會得到，而施之於言行舉措。這樣一個人，就他自己論，是一個生活有節制的人。對社會論，他是一個不同而和的分子，是一個能羣而不能黨的分子，是一個真正的健全分子。自勝的功夫由個人的內心出發，但其終極却是社會；它是健全的團體生活的第一個條件。

我所了解的學生自治是拿這種自勝功夫做基礎的。它原是每一個青年學生自己分內的事，初無須乎團體的組織。不過人品是不齊的。大學裏的青年固然會經一番選擇，但此種選擇既完全限於智識一方面，他們的性情，意志，甚至於基本的生理與心理上的健康，依然可以有很大的不齊，其程度也許和一般的人口沒有很大的分別。我們在一個學校的社會裏，所發見的個人生活的缺乏節制，往往不下於外間普通的社會，這大概就是一個原因了。因為人品不齊，因為有一部分人對自己的生活過於缺乏自勝的能力，團體的組織事實上也就成為必要。團體的力量，於最勉勵，一般人的自我制勝外，對

這一部分人，也可以收督促，警戒的效果。

我近年來所見到的青年生活的不節，最可抱隱憂的一端是公私不分。國家設學校，教育青年，是國家的責任。青年享受大學教育，是青年的權利。大體說來，這是不錯的。但若我們把這種權利與義務之分看得太分明，太認真，那就錯了。第一，求學不單是權利，也是義務，要大學教育辦得有效，學生和國家並不處對立的地位，權責之分根本上原是不應該太分明的。第二，大學教育去普及尚遠，在國難正殷的今日，才力上應該進大學而不能的青年更不知有多少，一部分已經在大學裏的青年，就才力論，也許根本趕不上這些失學的青年；他們自以為應享的權利，說得緩和些，是掙得來的，說得嚴厲些，是掙奪得來的，何嘗是真正分有應得？這兩層看法，許多的大學青年似乎並不了解。這樣一個青年完全受了狹義的權利觀念所支配。他一心着意在享受公家的施惠。公家要他付些代價時，即使這代價不過是一個名義的，即使他有能力付此代價，他也是斬而不與。他對公物是儘量的利用，甚至於儘量的糟蹋，惟恐別人多得了一份，他少得了一份。有時候更可痛心的，他竟會把公物自由支配起來；假若有人自由支配他自己的東西，他一定會向學校當局告發，但自己自由支配起學校的公物來，他却視然不以為恥，對公物作自由支配時，這種人往往還會利用團體的名義，有時候並且會成爲一種團體的行動，好像出之以團體，便沒有罪名似的，或許以為即使有罪，當局也不容易確實指認，無從查辦！

公私不分不過是大學青年行爲不檢的一端，其它可以指出的還有。不過，假若大多數的青年能在這一點上多下一些自勝的功夫，其少數缺乏自勝的力量，再由學生組織從旁加以督促，我敢斷言學校團體生活的健全，已經可以增進不少。不但如此，就青年學成後的事業而論，這也未嘗不是最關緊要的一點。近年辦教育的人時常聽見一種批評，就是，以目前學生的行檢而言，恐怕將來的政治與社會事業不會清明到甚麼程度，所謂不清明，其實就不是廉潔，不乾淨；這種皮裏陽秋的話不還暗示着公私不分的一大惡德麼？



關於其它兩種名不稱義的學生自治會，我不預備多說。也不值得多說。第二種的學生會當然也有它的好處。練習組織，守法，服從領袖等等，不用說，是很好的。團體越大越是組織不起來，就是勉強拼湊成功了，動不動也容易鬧翻——這原是我們的一大通病，上自全國的政府，下至學生結社集會，歷年來在這方面已經不知吃了多少的虧。所以這方面的訓練是很需要的。至於練習替大家辦事，或管理膳食；或協同學校維持公共衛生，或編印一種刊物，再或在文藝上作些團體的表現，例如舉行演說比賽會或編演一種劇本等等——這些，都不妨在課餘做一點，做了總有幾分益處。不過大家得了解，這並不是學生自治工作的主體，根據上文比較嚴格的立場來說，它簡直和學生自治很不相干。至於在學校範圍以外的種種，例如辦民衆學校，宣傳這樣，宣傳那樣等等，更是與自治的意義背道而馳，不值得鼓勵了。自治應當是每個青年對內心的一種工作，而這些所謂服務的活動却是一種外務，一種舍己耘人的勾當。這勾當並不是根本不應當做，一個人充實了自己以後，儘管幫別人的忙，也是應該幫別人的忙，不過，那我們不能不假定是應該在個人學成之後。服務是一個很動聽的名詞，發揮得最多的要推基督教徒，但目前大部分的基督教徒，連西洋的也算在內，也正犯着這個毛病，就是已不能立，而要立人，已不能達，而要達人，不先成己，而要成物！這種外務太多的學生會，因為切心於立人，達人，成物，我們不妨叫做學生治人會！

至於第三種的學生被治會，那更是自取而下了。學生治人會雖不足為訓，至少學生還居一個主體，到了被治會，他却完全成了一個客體。近年來因為政治的原因，外界常有種種的勢力，種種很有組織的勢力，直接和學生與學生團體發生關係。所謂直接，指的是不經過學校當局的手，甚至於完全不知照學校當局，學校當局要知道它們一些內容，猶且不可能，遑論管理。結果就發生兩種怪現象。一是學校系統內橫生了一些新的系統，為學校的統治所不及。喻以生物學，好像是人體內，長了癌，喻以政治組織，是邦國之內，又產生了一個邦國（*Imperium in imperio*）。我會親眼看見一個學生，

區以黨委的資格，大出布告，攻擊學校，後來又用同樣資格，向學校的副校長拍桌大罵。這是系統中別生系統所必然要產生的結果。第二種怪現象是這樣來的。這些外來的有組織的勢力種類似乎很多，性質不一樣，往往不一樣到彼此不相能的程度，於是乎傾軋與衝突便層層疊出。甲辦刊物，乙不容不辦，甲徵求同志，乙不容不徵求，甲在學生組織裏樹立勢力，擴大範圍，乙更不容不甘落伍。究其極，學校一般的生活既分裂之象，所謂自治會一類的組織更成一明爭暗鬥之場。有時候這兩種怪現象還會合而為一。有一次，在某大學裏，甲乙兩方起了衝突，學校照章分別加以懲處，而外界有組織的勢力竟會開學校要求收回某一方面的懲罰的成命！

不過學生被外來勢力的統治的弊病還不止此。要完全從青年發育與青年人格的立場來說，結果更可以教人痛心疾首。我們相信青年的時期是一個充滿着理想的時期，青年的心地是純潔的，是和平中正的，是富有探討與衡量的能力的。一個人在青年期內而沒有這許多特點，那他就終其身不必希望再有。教育的目的之一就在青年的忙，來培養這許多特點，使前途不因青年期的過去而成爲曇花一現的東西。如今外界有組織的勢力來到以後，因為主張總有幾分偏執，因所執不同，而不能不和別人競爭角逐，角逐之際，不得不用手段，於是理想主義去，現實主義來，中正變爲偏頗，和平成爲狠戾，純潔轉爲醜惡，探討衡量的機能日歸消滅，黨同伐異入主出奴的精神日以滋長，終於把一個二十歲光景的青年催促成一個「未老先白頭」的中年人。至於各派勢力互爭雄長之際，有時候不能不乞靈於金錢，那更是卑鄙醜惡，壞人心術之尤，我們如今提到它，也覺得有幾分罪過！

抗戰以來，局面算是改變了不少。外界一切有組織的勢力既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的活動，似可以不必再仰仗學問未成熟的青年，來做搖旗吶喊的工作，同志既從此可以自由徵集，也似乎不必競着先鞭，惟恐學校裏的青年被別人攘奪了去。我是一向主張學生不入黨，不入任何黨的，我如今還是這樣主張，我如今借這個機會，一面奉勸大學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夫不再來的青年時代，於理智方面力求自知，於情緒方面力求自勝，能自勝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強，一面更要替他們向外界的政治派別請命，讓他們有一個真正能自治的機會。

## 熱烈與遲鈍

吳景若

從表面看起來，好像西洋人比較熱烈，中國人比較遲鈍。不過從日常生活上觀察，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確乎是一個不善于熱烈表情的民族。無論是久別重逢的夫婦或是朋友，我們從來不用熱烈的擁抱或接吻來當眾表示歡欣；也從來沒有人看見過我們在國慶日那天喝酒，胡鬧，狂歡。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很少見過瘋狂的大的羣衆暴動，說得更淺俗些，在所有的國產影片內我們很難看見一個緊張的熱烈的鏡頭。不過，是否可以因為我們不善于熱烈的表情就斷言我們是沒有熱情的民族呢？這當然是不妥的。個人以為中國人不善于熱烈表情的原因，或許是為傳統習氣所束縛的關係。中國人向來輕視輕浮急躁而羨慕老成，所以常常對人加以「喜怒不形于色」的好評，假如有一個人當衆狂歡大笑，別人一定認為他沒有好的教養，甚至於說他是瘋子。過去舊家庭對女子，要他們「笑莫露齒，話莫高聲」，假如不許用大聲音說話，笑的時候也不許張着大嘴，事實上中國女子就被剝奪了表現熱烈感情的方法。

抗戰初起，北平的學生帶着汽水和餅乾去慰勞廿九軍的兵士，兵士們很羞澀的接近汽水瓶子，匆匆喝乾，有些兵士忽然堅決的把節瓶擲在街心，考其用意不外表示他們堅決的意志。但是他們的動作看起來很畏怯，生硬，不自然。他們雖有熱烈的感情，但是他們的表示並不充分。又如某地防軍出發抗日，到車站歡送的有很多學生，當列車緩緩出站時，學生的隊伍裏浮起壯烈的歌聲，並且叫着激昂的口號。而從車廂內伸出頭來的兵士，很笨拙的注視着我們，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我不相信他們純樸的心裏真是一點感動也沒有，但是事實上他們臉上確是沒有一絲感動的表情。我們從畫報上看見許多西班牙的兵士裝在開赴前線的卡車裏，他們的樣子都是熱烈而愉快。難道我們的兵士對於保衛國家的戰事就不感覺到興趣，以至於那樣的沉默嗎？在抗日戰役中，我們的兵士曾有過不少的可歌可泣的壯舉，這實足以反證我們

的兵士的熱烈和勇敢。平時我們看不見他們熱烈的表現，一定因為他們受着傳統習慣的束縛，很早就喪失了充分表現自己情感的能力。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人並不是一個沒有熱情的民族，有時候我們看不見中國人熱烈的表情，那是因為我們在表情方面比較遲鈍的原故。我們雖然「遲鈍」，但我們仍不失為「熱情」，如果一個民族實實在在有了熱情，倒不在乎他們表面上表現出來的是「遲鈍」還是「熱烈」。因此我們在這方面的「遲鈍」是不足為害的。

不幸我們的遲鈍不僅表現在這方面，同時還表現在行動中，不僅表現在個人的行動中，而且表現在整個國家的行動中。

中國人走路的姿勢就絕然和西洋人不同，西洋人挺胸凸肚，勇往直進，我們走路時總以從容不迫端方儒雅為上着；關於處置事情，中西民族也各有不同的習慣；西洋人辦事講求迅速明確，中國人辦事須審慎，須合乎人情。再看着中國一切的社會上的改革和變更也都是「慢慢來」的而不是突變的。在傳統習慣上，我們讚美雍容，和諧，安靜，因此反對粗魯急躁。然而在事實上過度的雍容和安靜必流于遲鈍，拖延，沒有生氣。這一個缺點影響于個人，可以使個人辦事效能減退，影響于整個國家，可以使整個國家不能充分發揮她的力量。這個缺點是最不適宜我們生存于現代的。

如果要追溯這個毛病的來源，我想可以牽涉到很多的事情。至少，一個農業國家幾千年的田園生活對於我們生活的態度當有若千的影響。我們幾千年來生活在遼靜和諧中，因此我們比較安于靜的生活，而不歡喜劇烈的變動，習于遲鈍而不習于進取。時代變得更得太快，我們習慣的變更跟不上時代，因此我們在新興的民族前格外顯得遲鈍，老大，無能。不過，這個毛病並不是不可以改掉的。新中國的建立真正完成，這個舊的習性也許就跟着消失了。抗戰以來，很多人常常說起後方民氣的消沉。似乎在各處都不容易見到

一點熱烈的戰時的氣象，這種說法的確是對的。我們試看鄰近戰區的城市，城中居民差不多逃光了，事實上百業停頓，無異于一座死城，自然不容易在這樣的城市裏激盪起激昂的空氣。至于遠在後方的城市，只有從人口增加物價上漲這兩件事上可以看出來現在是在打仗，其餘的一切和平時沒有顯然的分別。不過，若是單單就後方都市的沉寂就斷言中國民氣的消沉，這也是不妥的。一班民衆對抗戰始終是贊同，對敵人始終是不滅其仇恨，戰區難民流離蕩析餐風宿露，始終對政府無半句怨言，單就這些事實就可以測驗出目前的民氣並不壞。因為我們向來安于平靜的生活，向來在表示情感時不夠熱烈，向來在行動上十分遲鈍，更因爲一向就沒有學會過現代國民政治活動的方式，一旦戰事起來，我們就彷彿覺得並無事可做。所以結果一班人對抗戰的態度成爲：打的時候我贊成，沒有打來我閉着，真的來了我跑開。在情感上大家認爲抗戰是天經地義該作的事；在實際上大家又無從與抗戰聯繫起來，無從與抗戰發生關係，因此在我們後方的都市裏只看到一片寂靜，聽不見熱烈的呼聲。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否認在每一個角落裏也還有熊熊的怒火在無聲的燃燒着。

遲鈍這一習性表現于個人方面爲目前表面的民氣消沉，表現于整個國家

## 談讀尼采（一封信）

××：

你因爲學醫已經讀了幾年德文。你正在青年，你內心的發展使你不能於只讀德文的解剖學課本，漸漸開始讀一些德國文學和哲學的書。你讀過海涅和叔本華。關於海涅，我會勸你還是少讀爲佳；海涅的詩，幾乎每個學了一年德文的人都能讀懂，但是除却幾首很純淨的情詩外，大都是些油滑的腔調，使青年讀者只隨着那單調的韻律沉浮，不想對於感情作更深的試探，同時他阻攔着我們向歌和荷爾特林（那兩個德國最崇高的詩人）的路。叔本華的散文，流利通暢，淺顯易懂，讀着的確是一種享受，可以讀可以常常讀地

方面的則爲全國行政效率的不够。近來不少人談到戰時行政改革問題，甚至有人說抗戰以來我們動員的只是軍事，政治並沒有動員。這些情形也是實在的。熟悉中國官場情形的人很容易明白中國行政機構的不健全，行政官吏之無能，一切政令行使之困難，這一切情形抗戰以來並沒有大的改革。而這一種「效率不够」的毛病並不只限于政治方面，推而至于一些交通機關，金融組織，工商團體，幾乎無往不是帶着同樣的毛病。這些毛病，稍稍留意後方情形的人是不難明白的。

「熱烈」自然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過於熱烈的人往往易于衝動而不善于觀察，並且最熱烈的人在事業上也最容易失望容易悲觀的人。個人如此整個的民族，亦大體如此，雖然熱烈易流於浮躁，但是「遲鈍」決不能比擬深沉。當然最理想的人是能够冷靜的觀察而又能够明敏的實行者。我們整個民族在觀察事物上也許並不後人，但是在實行的時候，無庸諱言的，我們缺乏明敏的動作。

假如我們不够「熱烈」，那是無傷大雅的。假如我們過于「遲鈍」，這倒是整個民族的一種傷害。我們應該及早驅除這一個不好的習性，讓新中國建設的洪流把它沖洗到茫茫的大海中去。

馮至

要把牠當作美麗的散文，千萬不要以爲是在讀德國的哲學，理由講起來話長，將來有機會時再詳談吧。——最近你來信說，懷着無限的熱情在讀尼采，時時刻刻都離不開他。我聽了，我爲你歡喜，又爲你擔心：歡喜的是你能够把海涅和叔本華放在一邊，而和這近百年來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接近，我們只要翻開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便會感到一種新的刺激，新的啓發，新的戰慄。這種刺激，啓發，戰慄，在我們有史以來，算起來，並沒有多少次。擔心的是，怕你把尼采當作教主，看成先知，將他所說的話記在日記簿上作爲你思想上的根據，那你就將要永久迷惑，找不到出路。

近幾十年，在德國被人引用最多而最濫的，莫過於尼采了。他的話出現於各黨各派所著的書上，被人用爲書前的導詞，被人作爲行文的引證。在社會主義者的宣傳冊上，法西斯黨人的演說詞中，在無神論者和天主教學者的論文裏，都能發現尼采的話。他的全集幾乎成了格言寶庫，儘量供給各黨各派的掠取。尼采自己也說過：「最壞的讀者像是掠人財物的兵：他們拿去一些他們所能用的，汗毀了，攪亂了那些剩餘的，冒瀆了整體。」而偏偏是尼采遭遇這樣的「兵士」最多。至於這種遭遇的原因，就是他著作中充滿了相反的意思。因此一部分被人「拿去」，一部分被人「污毀」，而整個的尼采遭了「冒瀆」。當你想引證尼采的一句話時，你就要提防在他另一部或另一頁的書上有一句意義相反的話在等待你的反對者來引用。——所以我們真完一段，不管那那有力量的文字是怎樣感動我們，千萬要立刻把它當作真理。最好是把他對於某一問題所發表的意見，聚集起，把不同的來比較追溯這些意見不同的原因，同時不要忘却整體。尼采曾經受過嚴格的 Philologie 的訓練，他這樣讚美 Philologie：「她教給我們讀書，那就是慢慢地，深深地，瞻前顧後，懷着沈思，打開坦蕩的門，用精細的手指和眼去讀。」我們讀尼采正應當這樣讀，不要把他的著作任意割裂。

再進一步，尼采不希望讀者成爲他的信徒。凡是先知先覺，都是教大眾信仰他。如果尼采也是先知，那麼他只讓大眾信仰一句話：認識自己的路。他說：「你只要忠實地跟隨你自己吧：——那你就隨從我了。」這就是我的路——那裏是你們的呢？——我這樣回答那些向我問路的人。「他不但讓我們走我們自己的路，而且教我們在讀尼采的時候處處要防備他；『我要喚起對我最深的猜疑。』」一個大師的天職是要讓他的學生防備他自己。」尼采覺得一切意見，一切真實，都要自己親身體驗，親手去取，絕不是一件物品或是一種技術似地可以互相傳授。尼采不要求信徒，他最怕有一天被人稱爲聖者。——你一定要問，在蘇魯支的口調裏不是充滿了說教的語氣，而蘇魯支不也是披著教主外衣出現嗎？——但是我們要認清：蘇魯支並不是

尼采，尼采只不過是寫蘇魯支的人。

上邊兩點是一般尼采讀者最容易犯的毛病。但是我們應當取什麼態度呢？我們要了解他的書，不能不顧及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怎樣呢？沒有家，沒有職業。沒有團體，只是在瑞士的山上，意大利的海濱，從這裏遷到那裏，從那裏遷到這裏，他是一個永久的漫遊人，在人生萬象中他是一個旁觀者；人類的問題幾乎沒有一件不映入他明銳的眼中。他常常患病，病使他的思考深沉。他對於人生下犀利的批評，有獨到的解釋。在這不斷的批評，不斷的解釋中，他分析支配歐洲文化有十幾世紀之久的基督教是奴隸道德的產品，認爲自從歐洲中古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許多哲學家所創造的哲學系統只是對於現實的規避，（關於哲學系統，那位和尼采很相似，比他早生半個世紀的丹麥的思想家 Kierkegaard 說過這樣有意味的話：創造系統的哲學家好像是一個人建築了華麗的宮殿，自己却只能住在旁邊的木板房裏。）他面前的世界是隱蔽在道德，宗教，種種傳統的面具下活動，而這些面具都是空虛。無怪他立在高山上，俯視塵寰，想到他所處的時代，有置身廢墟之感！所以他在他的自傳中，一再致意，說他是 Dekadenz 時代裏產生的兒子，可是這個兒子的渴望新生，正如人在病中渴望健康一樣。他在病裏觀察，健康却是一個遠方的憧憬：什麼「超人」呀，「向力的意志」呀，便在他的憧憬中閃爍着。

他對於人生的一切批評和解釋是從什麼地方出發呢？當尼采把許多道德觀念重新估量而加以否定時，他却認定一種道德基本是確鑿不可移的：正直（Redlichkeit）。在他看來，我們只需要純潔，不管是哲人也好，或是一個舞台上的小丑也好。這種對於純潔的需求，便是尼采所謂的正直。只有心懷正直的人，才能放開眼光，廣看萬象，而萬象也赤裸地映入他的眼中。他說，「不是在你們的限停止認識的地方，却是在你們的正直停止的地方，你們的眼才毫無所見。」可是這種對於純潔的需求，在人生不但被虛偽所騙，並且也常常被「善」所蒙；我們應該立在善惡的彼岸，養成能以感受這個字的力量，然後方可以漸漸和尼采接近。

另一方面，我們要忌諱執着，我們知道尼采在希臘文化裏發現了 Dionysos 的精神，而為舞蹈唱過讚歌。舞蹈在他是一個比喻，比喻我們流動的人生。安息或停滯的地方，便是虛無，枯僵；人們時時要努力從虛無或枯僵裏跳出來。人生如此；他的書，也無處不在流動；我們讀他，像是置身於春夏之交的時候，那無常的風雨、冷暖的變化，使我們無時不有新的感受；又像是投影於一條涓涓不斷的河流，我們的影子和我們的周圍隨着水紋波動……

## 人

### 夢語

埋掉你人生一切的慾望，  
也別在雲輪上再描你的幻想，  
斬除你胸中的喜、惡、和柔情  
用不着悲傷，反正你到如今  
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  
（你得承認這世紀給你只剩下）  
禿山，死草，一片鐵青的天。  
文明熱爛了，腐臭了，生了毒，  
城市變成了荒墟，田野吸飽了血，  
幾千年歷史的榮華化一縷煙塵；  
萬丈的長鞭鞭在我們  
袒裸的背脊上。到如今你我真是  
什麼都沒有了，  
只兩眼空空，  
兩手空空，  
赤條條一個身軀又回返到  
灰濛濛太古時期的  
一個無所懼，無所牽掛，  
孤零殘忍單純的「我」。  
我們也看見過大禮帽，紅酒與詩歌，

我們去隨着他想，隨着他動，但是不要模倣他。  
再用一個比喻來說，尼采是一片奇異的「山水」，一夜的風雨，啓發我們，警醒我們，而不是一條道路引我們到一座聖地。  
到這里，這封信可以結束了。信裏的話，多半是我初讀尼采時所走過的路，寫給你供你參攷。

### 孫毓棠

四輪車像水，繞着高樓流，  
畫筆下的春光，是樂園的微笑，  
美女有花頭和花樣的衣服；  
我們也懂得思想的霓裳舞，  
最細膩的悲哀和最美麗的愛情  
但是到如今，這個世紀裏，  
你我已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能了。讓我們  
把這些人生瑣碎和零星的  
抓兩把，向一陣狂風颳  
都揮向太空一萬重雲海外。  
到如今我們很簡單，  
伸開空空的兩手向着蒼穹，  
我們要的只是大地，大地和  
天風——天風，你吹醒！  
要你吹得猛，吹得剛強，像劍，像刀，  
我們赤裸着身軀站立在  
赤裸裸大地的高原上，  
我們已無所懼，無所牽掛，  
要頭頂着罡風作另一種人。

你不信？我讓你知道，  
 雕鷹給了我兩臂的鋼爪；  
 黑熊有眼睛，我也有眼睛；  
 獅子給了我鬃髮的陰翳和毒狠的心；  
 山狼給了我一條紅的舌頭；  
 巨鯊給了我一身甲，獵狗給我嗅覺；  
 章魚給了我抓繩的力量；  
 森林裏我會吶吼，敏捷我舉猿猴；  
 我胸膈裏沸着蜈蚣的毒水……  
 誰要來撕殺？好哇，儘管來，  
 我正要黏膠，鮮血和肉，  
 好緊攔住這戰爭的世界和時代！  
 你我是萬萬年來禽獸的子孫，  
 自然得回返為嘶殺的禽獸。

如果我死了，我不怨天，  
 我一堆白骨也不會嘲笑我。  
 我深深地了解死。死，我不出聲；  
 萬萬年來已死的獸凌留下爪痕，  
 已死的飛禽沒留下半根毛羽。  
 如果我活着，啊，如果我活着，  
 如果我還有生命的烈火與力量，  
 如果我還有生命的烈火與力量，  
 我恨文明，我看不起愛情，我不想望  
 一切會毀滅的瑣碎零星；  
 我不要柔弱的青春，不要已往。  
 即便這世界只剩給我  
 秃山，死草，一片鐵青的天；  
 別看我赤裸裸，兩眼空空，  
 兩手空空，

在天風和大地之間，  
 我倒要燒煉出我多年熱望的  
 一個嶄新的世界和嶄新的新時代。  
 我要在我創造的新時代裏  
 作一個無所懼，無所牽掛，  
 殘忍而單純的創造的人。

原始時亞當初逐出天門，  
 當前也是座蠻荒的世界：  
 秃，死山草，一片鐵青的天，

空曠，新鮮，有的是時間由着他擺佈。  
 他對，他錯，我們都不管，  
 他倒會作了他當作的工作——  
 千萬代人生人，和人造的罪惡。  
 如今世界是重又回頭了，  
 上帝把靈覺交给了我，  
 我們也有智慧，時間，與力量，  
 讓我我再開始另一度的創造：  
 索與叫花蛇釀好了毒，  
 盤在你伊娃淫蕩的肚子裏，  
 好重生產比禽獸更殘酷的人，  
 重創造比人心更陰險的文明，  
 重擺佈比文明更兇狠的戰爭，  
 教將來你我千萬代子孫，  
 一代代去慢嚼這無極的罪孽。

我們可以笑了，因為我們  
 有未來，有前程，又懂得善惡……

### 醒語

砲火在青天上，砲火在  
 原野和海洋上；更兇的砲火  
 將要在未來的每一分  
 每一秒的時間和空間裏。  
 我愛這人生，愛完美和光明的人，  
 也該愛毀滅，愛陰黑，愛死。

### 本期撰者

張德昌先生是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錢端升與潘光旦兩先生在本刊俱已有  
 過文章，是讀者所熟識的。

馮至與孫毓棠兩先生均是現代詩人。前者著有「海盜船詩集」，長於作  
 敘事詩，它的歷史敘事詩「寶馬」，年前於天津大公報副刊發表時，曾被譽  
 為新詩運動以來的有數著品。後者曾留德習文學，現在任教武漢大學，為國  
 內治德國文學專家。

吳景岩先生是西南聯合大學學生。

# 交通銀行

行銀業實國全展發為許特府政民國

◆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

◆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報電 話 電 址 地 行分明昆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碧金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 金城銀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 本刊 第一卷第六期

時評  
所望於國民參政會者  
國際聯盟與援華制日  
國情普查與雲南人口調查  
美國中立與遠東政策  
此彼  
冷屋隨筆之二  
居禮夫人小傳

王賴揚 王化成 戴世光 張道行 徵因 錢鍾書 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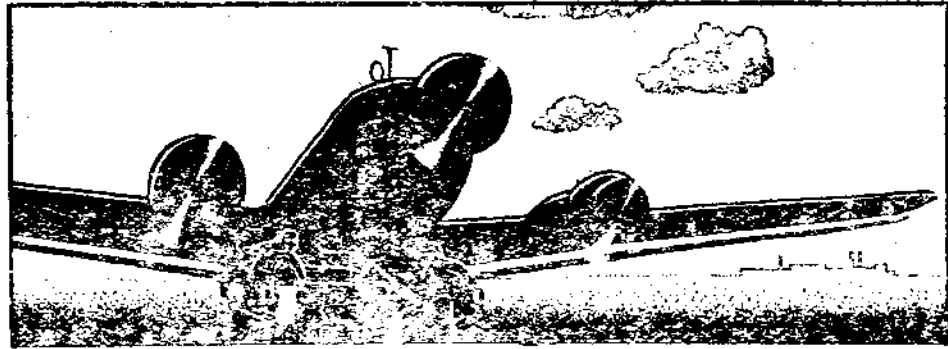
今日評論  
編輯兼發行者  
印代價  
刷者  
售者  
目者

本刊已呈請登記

本期審查證字第二十六號

每星期出版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朝報印刷廠  
全國各書局  
零售國幣五分  
訂閱 全年幣國二元  
半年幣國一元

本刊已呈請登記



利用下列各航線 載客 運郵 輸貨

- 1 昆明——重慶——成都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 2 昆明——成都——轉往——西安——蘭州——寧夏  
每 星 期 四 六 由 昆 明 開
- 3 昆明——桂林  
每 星 期 往 返 飛 行 一 次
- 4 昆明——河內——轉往——香港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歐 亞 航 空 公 司

昆 明 尚 義 街 三 號

本期審查證審字第三六號